



● 作者/Paul Heer ● 譯者/余振國 ● 審者/黃依歆

中共對美國的戰略挑戰： 理解與因應之道

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 from China

取材/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網站專文(*The Asan Forum*, April 3/2018)

對美國而言，今日來自中共的挑戰不同於當年的蘇聯。欲以建設性方式來應付該競爭關係，美國需要與其盟國更加理解北京的思考與行為模式，並且從中共觀點來定義它所關切的利益。

中共已構成對美國及其盟國的戰略挑戰，而且共軍現代化進程亦令人擔憂。(Source: DoD/Dominique A. Pineiro)



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共形容成「試圖破壞美國的安全繁榮」的「修正主義政權」，並且會「塑造一個和美國價值與利益相對立的世界。」¹ 伴隨該報告而來的是〈國防戰略〉，內容則附加北京意圖「否定他國經濟、外交和安全決策」，並刻正現代化其軍隊，以追求「短期內成為印太區域霸權，而未來將取代美國的全球強權地位。」² 誠然，中共已成為美國及其盟國前所未有的戰略挑戰，尤其是在東亞地區。然而，這兩份文件反映出華府對中共的刻板印象，並且不願去理解中共真正的行為動機。另外，先入為主地將中共視為傳統、具冷戰意識型態或安全威脅的態度，會阻礙吾人正確理解中共帶來挑戰的本質，以及發展周密、有效且充分維護美國及其盟國利益的戰略對策。〈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對中共根本上的錯誤認知，可能將華府導向成本過高且毫無效率的歧途。

2015年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受訪時曾說，就其觀察所得，毋庸置疑「中共本身對美國的戰略構成根本性挑戰。」³ 但不同於主流論述，這一挑戰主要不在傳統的安全領域，而且也不在美國必然占上風的物質和精神層面。這個挑戰不是蘇聯式的意識型態與存在主義；然而，這樣卻更難以對付。因為與蘇聯不同的是，中共正愈來愈以自身方式面對美國，而

相對於華府，北京在國際上的權力和影響力都持續成長中。要想以建設性方式來應付中共的挑戰，美國需要與其盟國更加理解北京的思考與行為模式，並且從中共觀點來定義它所關切的利益。

首先，中共在東亞(和其他地區)的戰略意圖其實與共產主義無關。這樣的企圖心超越了共產政權的本質，北京的外交政策很久之前就與共產主義意識型態脫鉤了。儘管中共與北韓還經常強調彼此的兄弟黨關係，但兩者也逐漸受原本的地緣政治所牽動，而非共同的意識型態。再者，中共宣揚其發展模式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動的。自從2017年10月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十九大)以來，習近平和其他高級官員都標榜中共發展模式是其他國家的「新選擇」，⁴ 部分原因是為了回應川普政府表面上放棄宣揚美國模式(以及在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而失色的美國模式)的態度，藉此獲得加分的機會。在隨後與外國政黨代表的會面中，習近平強調中共「樂意分享」其發展模式，但不會「要求他國仿效」。⁵ 事實上，習大肆宣揚中共經濟模式，可能或多或少只是為了訴諸國內人民的認同。最重要的是，中共並不渴望如前蘇聯那樣建立世界性社會主義，而是樂意與民主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北京在十九大前後，已多次強調在經濟、政治體系上接受全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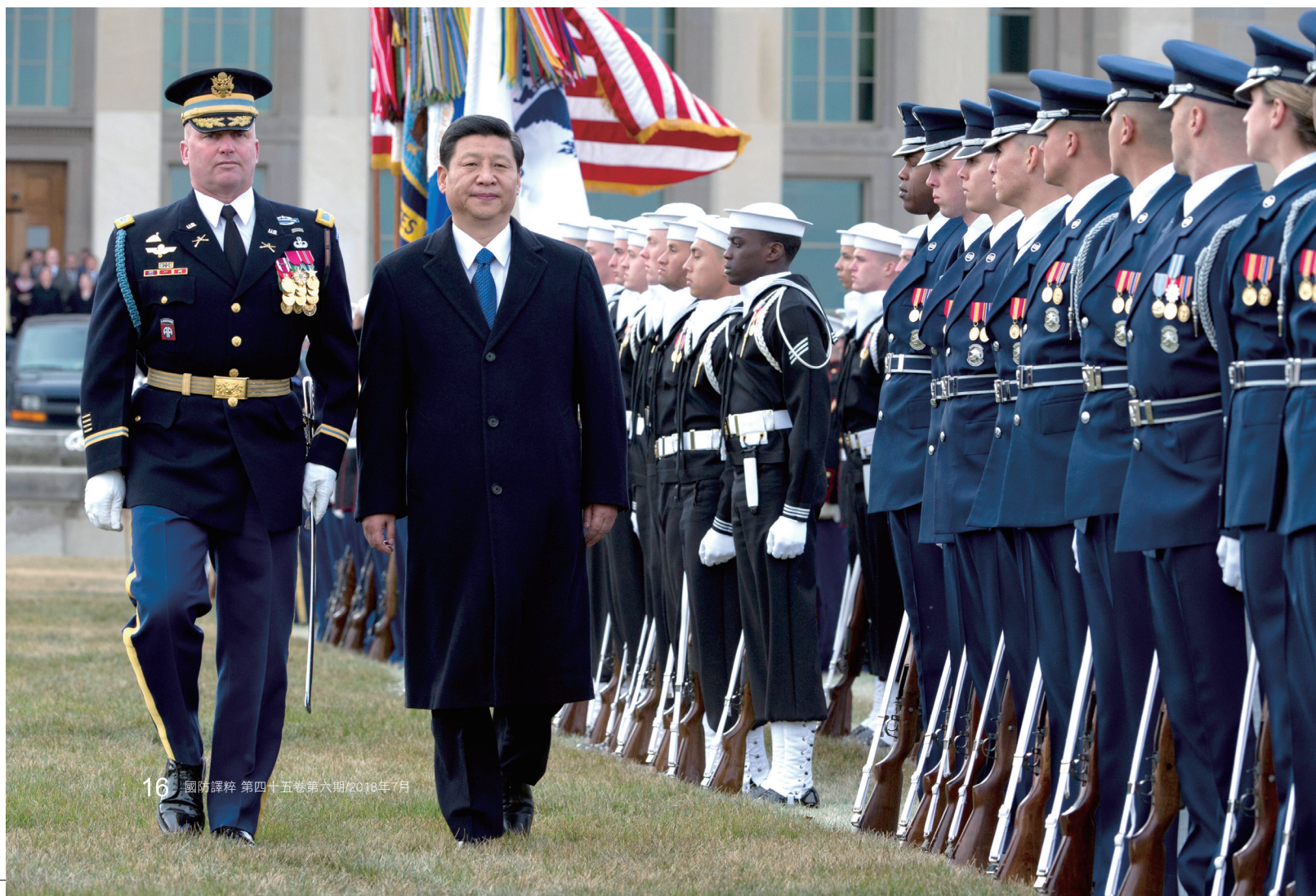
的「多樣性」。

其次，中共無意如前蘇聯那樣顛覆或剷除「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或阻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維護此體系的國際組織。北京反倒是在如聯合國、G-20峰會等西方建立的國際組織內，積極尋求自身利益，因為中共認為多數這些機構都對其有利。這樣看來，中共是一個現存的大國，願意在現有的國際秩序架構下追求利益與企圖。同時，中共也像是一個「修正主義者」，意即它一直希望調整該架構下長期之權力平衡，並對此感到不自在。(中共所面臨的挑戰是華府的現狀，也就是美國長期以來作為國際政治中心的強權。)事實上，

這也是為何中共與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接軌的原因。在十九大上，中共資深外交官員楊潔篪在解釋外交政策時強調，北京「朝更為公正合理的方向，致力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⁶換言之，中共意在更新而非廢除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以符合其定義之「全球權力再平衡」。

中共以東亞為中心建立的新多邊機構，諸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即反映了這種取向，亞投行旨在「強化」中共在現有國際秩序內取得的成就，而不是「取代」該秩序。在這種背景下，中共「一帶一路倡議」也應該被視為擴大其在歐亞大陸的經濟角色，並進一步延伸外交影響力。

中共是一個現存的大國，並且願意在現有的國際秩序架構下追求其利益與企圖。(Source: DoD/Chad J. McNeeley)



這是簡單且可預期的行為，中共利用其影響力在各地區進行多樣化的手段。⁷ 這些是中共地緣戰略的自然優勢，以及在歷史演進下權力平衡趨勢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儘管美國對這些趨勢感到不安，並且對北京意圖普遍持懷疑態度，但吾人不應認為國際法反而使中共比世界其他國家更能運用權力與影響力，就將中共的行為歸類為「擴張主義」或「侵略」。

第三，中共的國際行為本身並不像一般揣測或描述的那樣，主要受到其國內政治或高層變動的影響。無疑地，內部因素在中共對外行動上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在主權問題上會築起強硬防線，因為高層有義務迎合中共內部的民族主義意識。⁸ 但這只會強化高層自身的民族主義本能，而這本能有根深蒂固的歷史根源。中共外交政策有部分受到為保持國內經濟發展之外部需求所驅動，這對該政權的國內威望和合法性至關重要。雖然這在任何一個政權中都是常態，但與一些觀察家支持理論完全相反的是，歷史上中共領導人從沒有為了轉移國內問題的注意力而猛力對外抨擊。最後，中共的對外行為也不應如許多評論者所言，過份歸因於習近平的個人政治動機或領導風格。習近平繼承了中共外交政策的歷史性和系統性因素，在他掌權之前，由於戰略和其他原因(包括對其他國家行動所做出的反應)，中共就已呈現「強勢」的態度。⁹ 簡言之，北京的國際行為根本上是受外部因素和環境影響，尤其是中共對自身戰略環境的認知，而非內部因素使然。雖然聚焦於內部因素看似合理，卻有忽略甚至否認外部戰略因素的風險。

從了解歷史下手

要充分理解這些戰略因素，我們需要更進一步去追本溯源。影響中共對外行為主要和最重要的源頭，是其二十世紀的歷史經驗(在共產黨掌權之前，甚至是更早)，迄今仍深植於中共領導人和民眾心中。不過，儘管當時中國受外國列強的欺凌，但「百年國恥」這個長期的說法有言過其實之嫌，教科書中對這段時期的描繪盡是選擇性及片面敘述。¹⁰ 但是中共訴求的真相不能被認為是宣傳，或因年代久遠就加以忽視。事實上，如果不去認識這種歷史經驗的持續影響，吾人就不能理解今日中共的國際行為，更不可能發展出可靠的應對方案。

從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開始，直到二戰和1949年中共在內戰中取得勝利為止，有許多歷史事件造就了今日中共的民族主義思想。其中有一個事件相當具代表性，部分原因是西方幾乎未曾留意。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巴黎和會上，戰敗的德國被要求放棄中國山東省的殖民控制權。各國決定將該省主權移交給日本，而未歸還中國，即便日本在過去二十五年間曾多次侵犯中國主權。該決定引爆了中國對自身待遇的抗議，之後演變成「五四運動」，這可說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之源頭。當時中國震驚的是，西方列強儘管在巴黎和會上擁護「民族自決」原則，但卻如此不在意中國民族主義的敏感性，各國不僅要保留自身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它們在二戰之前就已這麼做了)，甚至還將中國的領土從一個帝國主義強權手中，轉移給另一個羞辱中國最甚的國家。¹¹

此一關鍵事件中最重要的一面是，它的發生早



於共黨成立與國民黨治理全中國之前。國共兩黨隨後持續發展此一思潮，時序進入二戰之後，雙方基本上都秉承著相同的民族主義目標，即廢除不平等條約、恢復和確保領土完整及國家尊嚴。(這一點迄今仍反映在中共在東海和南海的主權聲索上，由於同文同種的淵源，所以中共與中華民國的立場是相同的。)因此，與普遍印象不同的是，一般認為中共為宣傳目的創造或設計出民族主義的說法，反而與事實相悖離。中國的民族主義既造就了共黨，也造就了國民黨，而且它將比國共兩黨都會存活更久。因此，一些有關對西方和日本的控訴言論，都有其正當的歷史基礎。

毫無疑問，中共要為「百年國恥」期間所出現許多自身問題和失敗原因承擔極大的責任，這使

得它容易受到外部影響，而且中共還因為招致或強忍外國的介入感到挫折。但這種現狀既不符合中共民族主義者欲走出過去的陰霾，也無法抹去歷史現實和外國力量對其造成的持續影響。習近平在這一段歷史基礎下，提出所謂「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要恢復中共的富裕、國力與國際尊重。但是這個夢不是習近平獨有或創造的，他只是將中共成立和二十世紀之前民族主義訴求集大成，產出最新之版本。這也正是中共今日在主權問題上，如此堅持和強勢的原因，而且也說明了中共為何打從心底認為自身行動屬於被動回應和防禦的一方，而不是他國所認為的具侵略性和擴張主義。

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共的主權聲張是完全合理，



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戰敗國德國被要求放棄在中國山東省的殖民控制權。(Source: Wiki)

或者以合理的方式進行。許多北京對爭議海域的聲索，特別是在南海，其法律和歷史的基礎都很薄弱，而中共正以令人厭惡和適得其反的方式捍衛主權。我們也不要忽視或原諒共黨政權的本質，其治理不斷違反民主價值觀和民族情感。但這段歷史確實有助於解釋，為何即使是非共產黨員的華人(包括海外留學生和異議人士)也批評美國及其盟國干涉中共的主權宣示，還進一步阻撓美國主導的區域和全球影響力。中共

努力重建自認在東亞權力中心和世界的位置，並認為美國的政策旨在阻撓中共。由於中共長期屈服於外國列強的侵略，使得中共決心在亞洲地區或全球，永不再充當服從的戰略角色。這尤其適用於朝鮮半島的問題，北京認為自韓戰(中共企圖扭轉美國對其安全的威脅)以來，美國的存在和涉入目的在於圍堵北韓並侷限中共的戰略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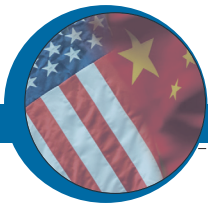
出於這些原因，當中共有能力和發展機會時，必定會傾向

於堅持自身主張並行使其影響力。這也是過去幾十年來愈來愈常發生的事情。無論是好是壞，北京非常成功將中共經濟轉換成一股影響全球的力量，並取得極大影響力。不令人意外地，如果中共利用這種長期追求得來的影響力來推進其戰略利益和目標，其中包括最大化其財富和權力，確保對外安全及埋葬「百年國恥」。若考慮到當前戰略環境，以及中共認知為達成目標的需求與機會，即使是在冷戰末期認為中共應



當中共有能力和發展機會時，必定會揚棄韜光養晦的作法，並昂首闊步於國際之間。

(Source: DoD/Dominique A. Pineiro)



「韜光養晦」的鄧小平，也都會準備好使中共邁步向前。

剖析中共挑戰的本質

中共經濟發展的成功也使其能大幅增強軍力，北京為追求利益和捍衛安全，已展示其戰備部

署。這顯然對美國及其盟友造成根本性挑戰，因為這可能違害這些國家追求國家利益及保衛國家安全，以及在衝突中有能力勝出的信心。但該根本性挑戰並不構成威脅，因為有能力不代表就會有意圖使用這項能力。北京和美軍一樣都厭惡軍事衝突，讓中共獲得與其規模和地位相稱的軍事

在美「中」競合的架構下，中共將無可避免與美國在各領域上較勁。(Source: State Department)



力量，不代表中共就有意對外動武，特別是用來對付美國。與大部分國家一樣，中共一直在增強其軍隊，目標是以防萬一。當中共認為有必要時才會使用軍隊，但並不會為此尋找理由或

藉口。儘管中共增長的軍事力量帶來了令人生畏的影響，但該戰略挑戰不見得主要是軍事挑戰，也許更重要的是，以軍力來回應或解決該挑戰並不妥當。

近來有人聚焦於中共近期對國際規範的挑戰，原因在於北京違反了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公認的原則，這是一個重要且嚴肅的問題。不過，這是一個灰色地帶，因為在國際法上的解釋並沒有共識，以及其他國家也進行過相同的舉動，因此說中共有系統地違法仍存在爭議。中共和其他大國一樣，也選擇性地遵守國際法以符合其目的和利益。在國際貿易中，中共顯然選擇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但這既不獨特也不見得違法；由於中共的承諾和義務有不同版本的說法，其遵守世界貿易組織規範的程度可能也很難評斷。¹² 同樣地，中共的網路活動和對外的「影響行動」，無論在範圍上和對其他國家的潛在威脅上，都有令人震驚的影響。但在這些領域中，目前尚不清楚什麼是公平或標準的作法，因而很難斷定中共到底何處犯規。最後，儘管中共明確主張在

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反自由」的思想和價值觀，¹³ 但這並非如前面所述，試圖取代或破壞該秩序，反而在其中的公開競爭中獲得加分；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或至少計畫經濟的部分)仍然是可行的，甚至在世界上某些地區很受歡迎，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揭發中共缺乏遵守規範的行為是一片關鍵拼圖，但依然不是其帶來挑戰的核心要素，因為當中共同意遵守規則時，就已經對美國及其盟友造成根本性挑戰。

總而言之，中共對美國及其盟友的挑戰主要不在意識型態，或它試圖推翻國際體系，甚至要在一場零和競賽中戰勝美國。該挑戰主要不在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甚至軍事安全上，相反地，它首要在威脅美國長期以來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特別是在東亞地區之地位。中共要爭取的是戰略影響力、經濟和科技優勢、國際尊重、行動自由，以及滿足自身的利益，而這些都是美國長期以來享有的權力和影響力，且不打算拱手讓人。但中共正以合理的大國抱負、一些有根據的歷史恩





怨、可觀的資源、日益增長的信心、準備進行全球競爭的決心，以及最重要的是建立真正建設性和合作性關係的興趣，嘗試達到目標。吾人可能因為專注於中共的政權特質，或是被其具攻擊性或不公平的舉動所矇蔽，導致錯估了此目標。

因此，美國面臨中共這個前所未有的挑戰，完全不同於當年蘇聯的威脅。中共不希望除掉美國或與其交戰，但它將追求「中國夢」，以恢復中共的富裕、權力和大國地位，因而將不可避免地與美國在國際影響力上交鋒。中共將持續且無情地在各領域追求此一目標，特別是在非軍事領域，而且還將在華府的規範下進行，甚至在美方的地盤上。這也是為何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指出：中共將會「在政治、經濟及軍事等領域，使用科技和資訊……以擴大(其)影響力、贏得競爭優勢以對抗美國。」中共還將採用「經濟誘因和懲罰、施加影響力和軍事威脅等手段，使他國服從其政治和安全主張。」這的確是一個多方面的巨大挑戰。¹⁴ 但它並非如〈國家安全戰

略〉和〈國防戰略〉報告所稱，「塑造一個與美國價值觀和利益對抗的世界」，或是要「追求全球領導地位」。

近期有兩項戰略上的發展，使此一挑戰變得更為棘手。第一項戰略發展是美國及其盟友致力於對中共有問題的行為施以成本強制作法，藉此試圖重新導正或塑造中共之行為，而中共的反應則在不斷變化。由於中共的影響力愈來愈大，也感受到美國給予的限制愈來愈多(或者說美方已經準備好或傾向於利用此限制)，北京似乎開始下修美國願意且能夠投入制衡中共的預估成本。例如，中共可能傾向評估，由於東亞地區軍力平衡不斷演變，因此美國不致於冒險與中共發生衝突。¹⁵ 中共似乎也同樣認為，如果發生貿易戰，其能夠站在有利位置，在經濟上對美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於此同時，中共似乎正在提高它為維護自身利益而願意承擔的成本，尤其是在涉及諸如主權、安全和穩定等「核心」利益的時候。例如，北京似乎更願意接受在國內打壓人權所造成的聲譽受

損，以及在國外行壓迫之實的外交代價。考量中共不斷增長的軍事和經濟影響力，如果認為有必要，幾乎可以肯定，其會願意為「核心」利益而對抗經濟制裁。除非這兩種趨勢發生變化，否則只會愈來愈難影響中共的國際行為。於此同時，中共將在與美國的賽局中進行反擊：利用中共的權力槓桿，試圖以更有利於中共利益和偏好方式去修正美國的行為。

與第一項息息相關的第二項戰略發展，就是國際間改變對美國的觀感，認為美國正忙於解決本身的政治僵局和經濟問題，這些問題反映出美國相對的「衰退」，或是美國對外的注意力、承諾及信用能力的下降。在東亞地區，這讓各國更懷疑美方對此區域的注意力。這項觀感在川普政權執政前就已經存在了，但在川普上任後變得更加強烈，特別是在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後，以及美國在該地區外交政策的猶疑不定。這也使得其他東亞國家更容易受到中共的外交、經濟和軍事的影響。反過來，這也反映出中共努力對付圍堵自身的美國政策。

很多東亞國家都已開始重新調整其外交政策，以減少對美國政府的依賴，同時避免與中共對立。

這兩項戰略趨勢也反映在中共目前對北韓的處理方式上。在朝鮮半島的戰略影響上，中共基本上認為美國是長期的競爭對手，因而它正在運用其權力槓桿，主要是經濟和外交的影響力，來確保自身在該地區的角色和利益。中共將根據預估自身的相對影響力，來計算如何形塑、以及必要時阻止或

抵制美國在半島上的戰略決策和行動。於此同時，中共將向首爾和平壤同時提供積極和消極的誘因，以維持中共對兩者重要性的平衡，同時意圖使兩者依賴美國作為夥伴的不確定性增加。

迎接挑戰

這場挑戰不需要陷入一場零和競賽，也不會影響美「中」建立具有建設性、互惠互利的雙邊關係，反而能使兩者認清並追求共同利益的關係。要建立

這樣的關係，雙方都需要比現在更能接受互惠、相賴及理解對方的戰略觀點。美國最終能否找到方法，以應對和顧及中共在亞洲及全球的野心，建立起求同存異的合作性關係，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華府是否準確理解並承認中共的觀點，以及造就這些觀點的歷史基礎。這也將視美國是否能重新振作起來迎接這項挑戰。

在此過程中，美國政府首先需要認清並承認過去數十年間，美國處於不斷變化的區域

美國需要承認並適應中共在東亞的崛起，並建立起求同存異的合作性關係。(Source: State Department)





和全球的權力平衡中，特別是在東亞的角色定位。現今的情況已經跟1945年或1991年大不相同。美國面臨著截然不同情況和更具競爭性的國際環境，需要重新審視其已長期習慣的角色。¹⁶ 自二戰以來，大多數東亞國家都認知到(有些國家感到不安)，美國超強地位是歷史的反常，其基本依據和永續性都不是永久的。華府需要開始用長期的觀點，思考美國在東亞應有定位及能夠扮演的角色，並設計追求該目標的策略，同時既不引發衝突，也不損害其美國及盟友的核心利益。美國若刻意維持一個不能持續，或不顧史實的角色，可能會事倍功半，並加劇區域緊張情勢。

明確地說，美國需要承認並適應中共在東亞的崛起，該崛起與華府有關，且牽涉到中共與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區域互動中，所承擔的經濟、外交和軍事的責任。¹⁷ 不論華府在口頭上是否承認中共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美國應面對現實，積極建立美「中」雙邊關係，並立足在以下四點基礎上：一、承認美「中」經濟相賴；二、同意互不挑戰對方的根本安全利益；三、同意擱置或解決雙方利益分歧之領域；四、願意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進行最大程度的合作。

肯楠(George F. Kennan)在1947年7月著名的「X」文章中寫道，「美蘇關係的問題，本質上是一場對美國的全面考驗，考驗美國是否夠格成為國際領導強權。」¹⁸ 這句話也許更適合形容今日的美「中」關係，因為中共不同於蘇聯，它願意在美國的規則下與其競爭，而不是進行意識型態的零和鬥爭。如果美國對自己的價值觀和實力有信心，就無需擔心與中共競爭，或重新評估美國在東亞

的角色。美國雖然承認中共利益和安全意識，但不需要同意其共產政權的合法性，不必默許中共挑釁和脅迫的行為，或者將該地區影響力完全讓給中共獨佔。美國及其盟友應該繼續努力，影響中共的決策行為，堅持在人權、使用武力、公平貿易及國際事務透明度上的基本立場；渠等也應該保持自身防禦和嚇阻能力，並準備在必要時用以保護共同利益。同時，華府不應誤解中共是全面獨裁或擴張主義的產物，然後反對中共的願望和行動；而是應準備好認知何時與何地兩者預期會自然地競爭，即使這場競爭會是一場硬仗。如果美國接受中共為大國，與之相互協商與競爭，則就能抓住機遇與中共建立建設性的和平關係(儘管是競爭的)，進而有效維繫和確保美國利益。

這當然也是中共能否成為「國際領導強權」的一場考驗。「中」美在政治和經濟體系，以及雙方在國際行為上的差異，將是意見分歧和緊張關係的根源。只要中共在國內違反民主原則，在國外唯利是圖且以脅迫方式行事，就別指望美國會接受其國際抱負。但是，中共如果表明其戰略目標和意圖為公平競爭且合理追求，以及準備好成為國際事務上負責的利害關係人，則它也無需懼怕美國。

作者簡介

Paul Heer係喬治華盛頓大學兼任教授，前美國國家東亞情報官員(2007至2015年間)。他最新著作為2018年出版的《X先生和太平洋：肯楠和美國的東亞政策》(*Mr. X and the Pacific: George F. Kennan and American Policy in East Asia*)乙書。
Reprint from *The Asian Forum*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2.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3. “The Interview: Henry Kissing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October 2015.
4. 「習近平在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全文」，《新華社》，2017年10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special/2017-11/03/c_136725942.htm；宣言，「緊緊抓住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人民日報》，2018年1月15日。
5. 「中共願意分享，但不會出口中共模式」，《新華社》，2017年12月4日。
6. Yang Jiechi,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China’s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Qiushi* (English edition) 10, no. 1 (January-March 2018), http://english.qstheory.cn/2018-02/11/c_1122395899.htm.
7. 尤請參閱Evan Feigenbaum, “China and the World: Dealing with a Reluctant Power,” *Foreign Affairs* 96, no. 1 (January/February 2017).
8. 參閱Jessica Chen Weiss, *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9. 參閱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no. 4 (Spring 2013), 7-48.
10. 參閱Zheng Wang,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11. 參閱Margaret MacMillan, *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322-44.
12. 參閱Mark Wu, “Is China Keeping its Promises on Trade?” in *The China Question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 eds. Jennifer Rudolph and Michael Szony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13. 參閱Robert Daly, “Do We Want to Live in China’s World?” *Chinafile*, January 17, 2017,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do-we-want-to-live-chinas-world>
14. 來自中共地緣經濟的挑戰，尤請參閱Aaron Friedberg, “Globalization and Chinese Grand Strategy,” *Survival*, 60, no. 1 (February-March 2018). 范亞倫認為北京正「試圖進一步傾向對自身利益求取平衡，保護自我，減少對競爭對手和潛在敵人的依賴，同時開發經濟治國的手段，甚至在必要時，作為進行經濟戰的工具。」
15. 關於美「中」軍事平衡趨勢的全面調查，參閱Eric Heginbotham et al., *Tallying 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 Relative Capabilities and the Evolving Balance of Power 1996-2017*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5), and *Conflict with China Revisited: Prospects, Consequences, 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7).
16. 參閱 Christopher Layne, “The US-Chinese power shift and the end of the Pax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Affairs* 94, no. 1 (January 2018). Hugh White在“Power Shift: Australia’s Futur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Quarterly Essay* 39 (2010)中介紹了其想法，並於“Without America: Australia in the New Asia,” *Quarterly Essay* 68 (2017)中擴大解釋(筆者認為不那麼令人信服)。
17. 參閱Ezra Vogel, Michael D. Swaine, David M. Lamp-ton, Joseph W. Prueher, J. Stapleton Roy, and Paul Heer, “How America Can Lead in Asia,” *The National Interest*, December 12, 2016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america-can-lead-asia-18720>); and Michael Swaine, Wenyan Deng, and Aube Rey Lescure, *Creating a Stable Asia: An Agenda for a US-China Balance of Power*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6).
18. 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